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四一期 ——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203d)

【文革反思】	刘少奇是被谁打倒的？	杨学武
【文革一页】	政治夹缝中的绝路	李 响
【当事者言】	解读山海关机场机组走留现象	康庭梓
【名人往事】	我所见到的叶群	程 光
【痛定思痛】	践踏人格的转基因文革	萧 瀚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文革反思】

刘少奇是被谁打倒的？

• 杨学武 •

笔者乃“50后”，亲身经历过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怎么会不知道刘少奇是被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打倒的？毛泽东的“倒刘”檄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曾几何时成为我们学生必须“天天读”的课文，文中那些“一言九鼎”的“警句”，我至今还能倒背如流。毛泽东号召我们这些涉世未深的红卫兵大造刘少奇的反，把他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最后给他定的罪名一大串：“叛徒”、“内奸”、“工贼”、“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刘少奇被打倒后，惨遭迫害致死，死时不仅在京城没有“葬身之地”，而且在外地火化时连真实姓名也没有。一个堂堂国家主席竟然如此被“打倒在地”——九泉之地，可谓也是史无前例。

我既然明明知道刘少奇是被毛泽东打倒的，为何还要“明知故问”呢？我的“故问”之意是想说：刘少奇也是被他自己打倒的。我认为，毛泽东之所以那样“癞子打伞——无法无天”——不经过国家法律程序，甚至不经过党内组织程序，竟然一个人说了算，就随心所欲地轻而易举地把国家主席刘少奇打倒，不正是因为刘少奇当年大树特树毛泽东的个人威信，极力制造

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使毛泽东成为超然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神而造成的“恶报”么？恕我说句不敬之言，刘少奇正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块“石头”，就是他曾热烈鼓吹和极力制造的个人崇拜。

刘少奇曾经也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可靠接班人”。在当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为了瓦解以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集团”的统治，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党内的最高权力，形成以他为首的领导核心，特将本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排名靠后（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刘少奇一举提拔为仅次于他的第二号人物。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政治结合，取代了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与张闻天的政治结合，他们在延安度过了一段“蜜月期”。刘少奇从此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不仅全力以赴地协助毛泽东清算和瓦解了“教条宗派集团”，而且为强化毛泽东的绝对权力、树立毛泽东的个人威信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因为受王明、博古等人所组成的“亲苏派”的排挤，未能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他郁郁不得志，积聚了对“亲苏派”的很大不满。遵义会议之后，虽然借助与张闻天的结合而逐步取得了党和军队的实际最高领导权，但由于当时的中共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很大程度上受苏共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毛泽东的领导权还不大稳固，时不时受到手持苏共尚方宝剑的王明等人的挑战，尤其是毛泽东的思想在党内还没有形成统治地位，仍然被“张口马列，闭口斯大林”的王明等人垄断着市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刘少奇与毛泽东开始了紧密合作。刘少奇本来也是老资格的“亲苏派”，他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时，还受到过列宁的接见。但他不仅没有和王明、博古等人“同流合污”，反而与他们“背道而驰”。当时刘少奇与还是总书记的张闻天就白区问题展开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引起毛泽东的密切关注。高华在《抗战前夕延安发生的一场争论》中写道：“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刘少奇、洛甫围绕党的10年历史和白区工作评价问题展开的争论并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解决，刘少奇试图通过检讨党的历史问题，改变对10年政治路线评价的目的暂时遭受了挫折。但是刘少奇、洛甫的争论给中共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它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奏和一次针对‘教条宗派分子’的短促突击，为以后毛泽东、刘少奇全面批判六届四中全会政治路线，联手打倒王明等制造了舆论。”（引自高华：《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刘少奇和毛泽东结合之后，深知毛泽东对王明“教条宗派集团”不仅要从组织上解决问题，更重要的还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于是刘少奇以极其敏锐的政治头脑和高超的理论水平，把确立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当作了头等大事，他倒是没有把马列主义当教条，而是把列宁、斯大林对苏共实行思想高度统一的那一套理论和方法，“活学活用”到确立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实际上，最早提出了毛泽东的思想这一概念，并进行了系统性的理论阐述，极力主张把毛泽东的思想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使之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关于谁是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个”，中共党史学界曾发生过争议。原来一直把王稼祥当作“第一个”，新版《辞海》在“王稼祥”条目中就作了定论：他“1943年第一次提出和论证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翻阅史料，王稼祥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具体经过是，1943年7月8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文中写道：“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由胡长水所著的《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刘少奇之路（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下同），认为“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的非刘少奇莫属。早在王稼祥发表那篇文章的前两天即7月6日，刘少奇就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的文章，文中写道：“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

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来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胡长水据此认为：“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是王稼祥‘第一个’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纯粹就文字而言，此论当然可以成立。然而，如果不是拘泥于文字的表述，而是就其实质意义而言，刘少奇关于‘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党员、干部的观点，表明他实际上是全党最早提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人。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到‘毛泽东思想’，只是这一概念在文字表述上的简练而已。”

后来还有人研究考证说“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应该是张如心，他早在1941年3月，就在一篇文章中使用过“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尽管这个说法见诸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2版），算得上是权威意见，可笔者以为这种研究考证似有偏离主题之嫌。其实，弄清谁是“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让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使之登上“顶峰”成为“绝对真理”。即使刘少奇在毛泽东思想的文字表述上不算“第一个”，但他为确立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所做的一系列重要工作和重大贡献，已白纸黑字载入史册，是怎么也抹杀不了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特别是中共七大前后，刘少奇“日理千机”（毛泽东“日理万机”）的主要工作就是研究部署如何确立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他在党的七大筹备工作中负责党章的修改，“在领导这一工作中，他紧紧抓住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一主线。”“刘少奇强调指出：党章以毛泽东思想来贯串，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经过刘少奇精心策划、亲笔定稿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可谓是他为确立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之作”，“报告最显著的特点，或者说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影响最大、最深远的内容，是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刘少奇在七大会议上做这个报告时，满怀激情地说道：“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我想，我们的大会以至全党是会热烈拥护这种确定的。”刘少奇的这个报告，就历史影响来说，似乎比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还要“最大、最深远”。因此，似乎可以说，没有刘少奇，就没有毛泽东思想。正如胡长水所总结的：“历史已经说明，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内对毛泽东思想做出完整概括和系统论述的第一人！”

胡长水极力歌颂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贡献，他声称：“一些研究刘少奇的学者曾把刘少奇在这里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同几十年后邓小平主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作了一番比较，指出两者基本思路的一致是非常明显的。中国共产党内著名学者、理论工作者龚育之由此指出：‘新的历史决议案毛泽东思想，遵循着七大修改党章报告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思路、科学态度，有力地说明了刘少奇的政治智慧和理论遗产在今天对于我们的启示和指导。’”笔者认为，两位论者在这里回避了论述毛泽东思想的不同之处，即邓小平所论述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集体智慧或共同创造，并非毛泽东的“个人财富”；而刘少奇和王稼祥当年表述的毛泽东思想，却完完全全是毛泽东“个人所有”。王稼祥在使用“毛泽东思想”的同时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刘少奇则统统使用的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表面上看来似乎“只是这一概念在文字表述上的简练而已”，可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刘少奇提出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目的就是为树立毛泽东的个人威信，强化毛泽东的最高地位和绝对权力。刘少奇在那篇文章中首先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共产党经过22年的严格考验，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与历史事变中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有着极其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而特别值得指出的，就是在二十二年长期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二十二年来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他还进一步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和各派机会主义者斗争的历史。这种历史，在客观上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构成的。

党内各派机会主义的历史，决不能成为党的历史。”刘少奇对毛泽东的这些评价，其调子之高虽然不能与后来林彪的“顶峰论”和“四个伟大”相比，但在当时也堪称最高水平。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最后发出号召：“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几十年后林彪所题写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两相对照，除了文字表述有所不同，其精神实质有什么区别？

刘少奇精心确立和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旨在树立毛泽东的个人威信、强化毛泽东的最高地位和绝对权力，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如果说刘少奇是否“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尚有争议，那么他是“第一个”提出“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概念，则似乎毫无异议。1943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草案。刘少奇在讨论时郑重提议：在宣言的最后一段，加上“全体共产党员必能巩固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围”一句。胡长水认为：“这个提议，在党内明确地提出了毛泽东是党中央领导核心的问题。”看来，我们今天仍然在高呼的“为首”、“核心”之类，其首创者是刘少奇，他的这些“政治遗产”，至今还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

刘少奇当初是否预料到他把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的权威提高到如此高度，会造成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后果？胡长水对此作了辩解：“读这些文字，确实让人感到，刘少奇对毛泽东作了极高的评价，这种评价也是代表了当时党内大多数人的认识。也有论者据此批评刘少奇对毛泽东有过誉之嫌，并联系到后来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危害。是耶，非耶？尚待人们去认识。只是这种认识确是苦涩的。”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刘少奇当初把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的权威提得那样高，虽然主观上没有搞个人崇拜的“故意”，但客观上为后来产生个人崇拜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和奠定了“必然”的基础。随着中共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毛泽东的威望更加如日中天，刘少奇当年提出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随之“扩大化”到武装全国人民，以至于在文革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十亿人的大脑只有一个人的思想。于是，毛泽东成为万万不可不可冒犯的神，毛泽东思想成为万万不可怀疑的“绝对真理”；于是，谁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谁就是“反革命”，谁就要被“打倒在地”——轻则批判，重则坐牢甚至杀头。从延安整风运动中的王实味等人，到建国后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的胡风等人、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的彭德怀等人、反右运动中的几十万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无以计数的反革命分子，都是因为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而获罪而“罪该万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到这种地步，刘少奇应该负有间接和直接的重大责任，这是“是耶”，并非“非耶”。

刘少奇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仅在延安时期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在建国以后很长时期内继续“再立新功”。据李锐在《庐山会议真面目》（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中披露，毛泽东利用个人绝对权威把讲真话上“万言书”的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刘少奇在会议结束时专门发表讲话，严厉批判彭德怀反对个人崇拜，极力主张“积极地搞个人崇拜”。李锐回忆道：“刘少奇说：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党内也有人要在中国也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是有这个意见的。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了什么‘斯大林晚年’，什么‘没有集体领导’，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功于自己，等等。实际上，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就一贯要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的运动，我想，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在七党章上就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这一条。”为了证明自己“积极搞‘个人崇拜’”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刘少奇还引用了恩格斯《论权威》的几句话：“革命无疑问就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而反对权威的，“要么是散布糊涂观念，要么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刘少奇最后强调说：“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运动，赫鲁晓夫搞这一手，我看也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不应该那样搞。所以在二十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的事业的一种破坏活

动。”

刘少奇的这个讲话，把他“积极搞‘个人崇拜’”的历史毫无保留地公布于世，永久载入了史册。而且，他讲这个话，完全是以“正确路线的代表”而自居、以“积极搞‘个人崇拜’”而自豪的口气，根本没有一点反省、愧疚、不安的表示……李锐不无伤感地评论道：“刘少奇的这篇讲话，自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在当时是极具代表性的。因此，也可以说，庐山会议这场惊心动魄的党内大斗争，对提高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作出一次新的贡献。刘少奇后来的遭遇，使我不禁想起两句杜牧的文章：‘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张化在《刘少奇的悲剧与悲剧中的刘少奇》一文（载《回首“文‘和’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中写道：“在长期的斗争中，刘少奇曾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作过重要贡献。以后，又在历次关键时刻坚定地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包括对党内正在出现的个人崇拜现象加以某种肯定。”“作为对党的建设有过许多贡献的重要领导人，在个人崇拜的狂热气氛中才意识到个人崇拜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严重危害，……这是刘少奇的悲剧之一。”

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罗列了那么多罪名其实都是子乌须有，真正可以落到实处的无非就是“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一条。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刘少奇充其量就是在两个重大问题上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存在“大同小异”，似乎还谈不上是所谓的反对。一是在如何评价“大跃进”的问题上，说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与毛泽东“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稍有不同；二是在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刘少奇坚持给北大、清华等学校派了工作组，与毛泽东“放手发动群众”略有出入。毛泽东为何打倒刘少奇？毛泽东必有自己的理由，历史终将会真相大白。一个差不多把毕生精力贡献给毛泽东思想、一向主张对毛泽东“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人，怎么会一下子“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呢？刘少奇的被打倒之所以称之为“共和国历史上的最大冤案”，不就是说明刘少奇并未真正地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么？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所产生的恶果，而刘少奇批判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主张“积极地搞个人崇拜”，却被毛泽东打成“中国的赫鲁晓夫”。历史是无情的，刘少奇的悲剧，根源在于个人崇拜导致的集权专制，因此笔者“无情”地说刘少奇是被他自己打倒的，并非“感情用事”。诚然对于刘少奇的悲剧，我等后人足可“哀之”，然而我们是否既要“哀”其“不幸”，又要“哀”其“不争”？更重要的是还要“鉴之”，以免“使后人而复哀后人”？！

□ 原载：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

【文革一页】

### 政治夹缝中的绝路

• 李 响 •

一度有传言，说要调他去当主席秘书，人们都认为这是“高就”，而邓拓非但没有高兴，还私下忧虑地说：伴君如伴虎。如履薄冰的邓拓说过一个原则：“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

在许多70后、80后的记忆中，邓拓这个名字和《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联系在一起。1979年以来，这两本文集中的若干篇目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供代代学生阅读学习。有文艺理论家认为，邓拓杂文是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杂文的又一高峰。

正是这两本针砭时弊的文集，当年成了邓拓罹祸的导火索。1966年5月17日深夜，在“五一六通知”公布、“文革”开始的第二天，邓拓写下6000字遗书，解释那些文章并没有“影射伟大领袖”。次日凌晨，他掷笔，服下过量安眠药以死明志。他是因“文革”而自杀的一个人。20年后，邓拓当年的同事、《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鹰写了一篇报告文学：《玉碎》。他用饱含情感的文字，记述了邓拓自杀的前前后后。从此，“玉碎”这个华美而悲壮的词，成了邓拓之死的代名词。邓拓的死还有另一个冷酷的代名词：“祭旗”。“文革”以邓拓、吴晗的血祭旗，全国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成千上万的精英走上绝路。

#### ◇ 邓拓写稿倚马可待

1948年6月，在中共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解放区两大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日报》合并为《人民日报》。1949年8月1日，在太行山下游击办报十年的邓拓出任总编辑。邓拓18岁入党，25岁主编《抗敌报》（即后来的《晋察冀日报》），32岁主编第一本《毛泽东选集》，是宣传战线正宗老干部，主持中共中央第一机关报实至名归。刚一上任，他就展现了一个战场上走出的党报领导的魄力：第一，在各地建记者站，培养通讯员队伍，联络各省宣传部供稿，迅速打开全国格局；第二，要求每天发社论，树立党报的灵魂和主心骨。

邓拓上任是单枪匹马，没带任何老部下，他主持《晋察冀日报》十年间培养的骨干人才都已奔赴新中国各省机关报挑大梁。后来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胡绩伟回忆，当时大家都知道邓拓是党内久负盛名的才子，只是没见过他的真本事。写社论，我们都不会啊，听说他写稿倚马可待，那就请亲自写几篇示范吧。胡绩伟后来给邓拓之子邓壮讲了这段往事：“我们是有意考考你爸爸，说句玩笑话是给个下马威，可是考不住他啊。”

长年颠沛流离和伏案写作使邓拓落下腰病，从腋下到腰间打着钢骨架，但他举手投足仍然气度不俗。袁鹰说，第一次见到邓拓时，感觉他“像个大学教授，又带着军人风采”。即使盛夏大家都穿短袖，有的编辑穿短裤来上班开会，他也穿长袖中山装。冬天藏青，夏天浅灰，清洗熨烫得整洁利落，领口和袖口扣得一丝不苟。邓拓是个讲究绅士风度的人。曾任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的姜德明回忆，1956年姜的爱人有一天上班远远看见邓拓，就故意放慢脚步想让他先进门，邓拓到门口却不进去，待在那里特意为这个20出头的小姑娘拉着门。那时全报社都叫这个谦逊亲和的总编辑为“老邓”。

#### ◇ 是书生，但首先是共产党员

在人民日报社的十年，是邓拓一生最辉煌也最纠结的十年。新中国成立之初，这份中共第一机关报处在空前的风口浪尖，邓拓首当其冲，承受的精神压力和内心煎熬远胜于战争时期。建国初文坛三大公案：《武训传》批判、《红楼梦》批判、胡风案，《人民日报》在毛泽东主导下都起了直接推动作用。

1954年底，《人民日报》受上级指示要支持两个小人物写的一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此文批评了俞平伯红学研究中受胡适影响的唯心主义观点。邓拓告诉袁鹰，这几天不要上班了，在家赶紧把社论初稿写出来。袁鹰突击“憋”出来初稿交给邓拓，尽管已经尽力上纲上线，邓拓看后还是说，“火气不够大”，恐怕交上去不能过关。袁鹰最后被逼出一个办法：照着《武训传》批判文章抄，套着格式盖帽子。几个副总编和邓拓又修改补充了很多内容，终于拼凑完成。

临上版面的时候，邓拓指示署名“钟洛”（田钟洛是袁鹰的原名）。袁鹰纳闷，按照惯例，这种中央布置下来的重头社论应该署本刊评论员，而且邓拓等人增改了许多，是集体作品，署

个人名字也不好意思。邓拓轻描淡写地说：“没关系，就署你的名字。”再没多作任何解释。过了很多年，袁鹰才明白邓拓的苦心。邓拓不得不发这篇批判文章“表态”，但他想尽力避免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他没有办法，处在那个位置上，不仅不能逃避，还要参与，甚至去推动那些批判运动，他是个书生，可他首先是个共产党员”。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署上一个普通编辑的名字，尽力把影响力降低。

书生意气阻挡不了政治运动的浪潮。《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很快就扩大到文艺界领导的思想理论问题和宗派主义作风批判，又延伸到“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早在延安时代，胡风与中共文艺界领导人乃至毛泽东本人的分歧就已明朗化，胡风受到明显排挤。但邓拓对这个才子有惺惺相惜之情。1949年9月，邓拓邀胡风从上海到北京，为《人民日报》撰写人物通讯，特别安排他住在王府井的报社宿舍。袁鹰回忆，“当时宿舍很紧张，不是每个作者都能有这样的待遇，邓拓对胡风格外照顾。”

从1955年5月18日到6月8日，《人民日报》每天连篇累牍刊登声讨文章、读者来信和漫画，并在公安部直接干预下，刊登胡风与其“集团成员”的“反动信件”。邓拓心中的矛盾可想而知，只是他从未对任何人说起。“我父亲就是这样，工作上遇到多难的事回家一个字不会谈起。”邓壮说。

#### ◇ 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

不久之后有一件事，邓拓直接触怒了毛泽东。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热火朝天，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担忧急躁冒进必有隐患。6月，刘少奇布置中宣部起草一篇《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作为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邓拓收到稿件后略作修改排出清样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他们都做了亲笔修改和打磨，最后清样交给毛泽东审定。毛只批了四个字：“我不看了”。毛一向高度介入《人民日报》的编辑工作，“我不看了”是极反常的批语，其实明确表示对社论的不满。

邓拓看到批语左右为难。这是中央领导层的内部分歧，也是当时中国向何处去的路线之争。邓拓了解毛泽东的性格脾气。一度有传言，说要调他去当主席秘书，人们都认为这是“高就”，而邓拓非但没有高兴，还私下忧虑地说：伴君如伴虎。如履薄冰的邓拓说过一个原则：“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只要是根据领导指示办的，哪怕是犯了政治错误也算轻的；自作主张一旦得咎，那就可能被扣上“反党”的帽子。最后，邓拓小心谨慎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发排文章，使用五号字，不用社论惯例使用的四号字。

“这件事情上我父亲有点书生意气了。”邓拓儿子邓壮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他想着改小字号，让主席在情绪上也接受一些。可那印出来就是白纸黑字啊。”这篇文章一发表就注定是重磅炸弹。文中写道：“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仅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许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这是建国以后全国最早公开反“左”的社论。毛说：“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邓拓失去了最高领袖的信任。那段时间邓拓发起党报新闻改革，把《人民日报》由四个版扩充为八个版，借鉴民国时代办报经验，增设副刊，邀请名家写杂文散文。改革受到社会各界好评，但毛泽东认为改得很不好：“纸张紧张，还出这么多版，谁看得完？”1956年邓拓本来要被提名为八大中央委员，但他坚决辞谢，既是谦让，更是因为他已萌生了辞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念头。

#### ◇ 被毛泽东面斥“死人办报”

1957年反右风暴来临，邓拓终于被推到了悬崖边。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百

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又于第二年2月提出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各大报纸纷纷响应号召刊登给党和政府提意见的文章，而《人民日报》表现得十分“保守”。邓拓特别规定，对来稿要严格把关，在保持作者原意不变的前提下，删改激烈语言再发表，并且要加编者按语以缓和火气。毛泽东批评邓拓“书生办报”。1957年4月开始，《文汇报》《光明日报》发表大量大鸣大放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毛泽东多次公开表扬这两张报纸，指示鸣放要“加温再加温”，对于《人民日报》的不温不火，他的不满终于爆发。

4月10日下午，邓拓刚吃完饭就接到通知，毛主席要召见全体编委。邓拓、胡绩伟等6名编委乘车直奔中南海。他们被领进毛泽东的卧室，毛穿着睡衣，盖着毛巾被，躺在床上，半躺半坐，不停抽着烟，卧室里装满了书，床上有一半空间也堆着书。邓拓开始汇报工作，一开口就屡次被打断。毛说：“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中央开了很多会，你参加了，不写，只使板凳增加了折旧费。如果继续这样，你就不必来开会了。谁写文章叫谁来开会。”“你养尊处优，只知道汽车进汽车出。我看你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邓拓几次想解释都被顶回，最后他说：“我不知道自己像不像汉元帝，不过我实在是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希望主席撤掉我的职务。我几次诚心诚意提出过这个请求。”而毛说他是“假辞职”，并批评在场几个副总编辑“不敢革邓拓的命”，鼓励他们和邓拓“拍桌子”，“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为什么一点风都不透，没有一个人向中央写信报告情况？”

整整批了四个多小时，邓拓等人终于可以离开。回到报社他平稳情绪，一五一十把毛主席对他的批评传达下去。胡绩伟回忆，报社同志听说毛主席批评邓拓“养尊处优”，都难以接受，认为这点同邓拓同志根本沾不上边，也没有任何人响应号召打小报告“革邓拓的命”。两个月后，毛泽东派贴身秘书吴冷西到人民日报任总编辑。吴冷西分管新闻，看大样，定夺版面；邓拓任社长分管理论和文艺，明升暗降，事实上被架空。

#### ◇ 连当和尚的自由也没有

今天回望这段往事，有人说邓拓单纯正直，不善于察言观色，不会按照领导意图行事，才招批评。事实恰恰相反，邓拓是有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作为总编辑，七年来列席中央工作会议，他的政治敏感度非常人可比。起初，他觉得批评文章过火，有损党的形象，要删改再发。接下来他更多考虑的是保护作者。邓拓私下说：“主席说百家者两家也，我就更相信他讲的双百方针是假的，《人民日报》不能学《光明日报》、《文汇报》那样鸣放，学了要出乱子。”后来毛泽东在工作会议上又说了“引蛇出洞”。“我父亲这时就明白，登了谁的鸣放文章会害了人家。”邓拓说。直到“反右”拉开大幕，那些被邓拓压了稿子、删改过词句的作者才明白邓拓的苦衷。事后邓拓本人也不无后怕地说：“可见当时按兵不动还是对的。”

1958年1月，邓拓接到通知参加南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是党史上一次很关键的会议。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受到批评，承认“反冒进”是错误的。大跃进运动蓄势待发。在会上毛点名批评《人民日报》，提到那篇被邓拓改小字号发表的反冒进社论，恰在此时邓拓走进会场，毛泽东当着全体与会者说：“一说曹操，曹操就到。人民日报，革命党不革命。我给他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又不辞职？邓拓就是无能，我说过他是教授办报，书生办报，又说过死人办报。”邓拓在底下默默做着记录。

离开报社以前，邓拓约胡绩伟到京郊潭柘寺散步。他说：“我们党员，连当和尚的自由也没有，我真想在哪个深山名寺，落发为僧，读一点自己想读的书，写一点自己想写的文章。”



### ◇ 领军昙花一现的杂文热

邓拓来到北京市委书记处，担任主管文教的书记，这是邓拓的老上级、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安排，意在帮助他远离是非之地。邓拓告别了每天上夜班签版样的紧张工作，终于可以写点小文章。1961年3月，在《北京晚报》编辑几次热情邀约下，他开设了“燕山夜话”专栏，笔名马南村。燕山即太行山，马南村是邓拓游击办报驻扎时间很长的一个地方，笔名取的是谐音。“燕山夜话”轰动北京。1961年，全国刚刚遭受一场历时三年的大饥荒，言之有物、文风活泼的短小杂文，是难得一见的精神食粮。上至官员、学者，下至学生、市民，几乎无人不读。老舍刚读专栏时不知道马南村是谁的笔名，赞叹说：这是大手笔写小文章，作者不一般。各地报刊都学着燕山夜话的样子办知识杂文专栏，国内掀起了一股昙花一现的杂文热。不久，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也想让邓拓开专栏。他同时写两个专栏任务太重，于是邀请吴晗、廖沫沙加盟，三人都是老革命、老写手。他们一起吃饭，边吃边谈，取了吴南星这个联合笔名，吴出自吴晗，南出自马南村，星出自廖沫沙的笔名繁星，专栏就叫“三家村札记”。

从燕山夜话到三家村札记，邓拓引经据典，运笔犀利，写了多篇后来被指为“影射”的文章。比如《两则外国寓言》，先讲了《伊索寓言》和《克雷洛夫寓言》里两个吹牛的故事，最后写道：“山雀在牛皮吹破以后，只不过害羞地飞走了，这当然是幸运的；应该看到，在另外的情况下，牛皮既已吹破，受骗的人们就决不会轻易地放走吹牛的骗子。”《智谋是可靠的吗》一文，引用《三国演义》《史记》《淮南子》中的典故，提出“任何智谋都不是神秘的，不是属于少数天才的，而是属于广大群众的”。《专治“健忘症”》尤其被姚文元指为“恶毒诬蔑党的负责同志患了‘健忘症’，用心十分险恶”。在此文中，邓拓写到健忘症患者“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引用《灵枢经》，说“得这种病的人不但是健忘，而且慢慢地变成喜怒无常，说话特别吃力，容易发火，最后就发展为疯狂”。又提到巫医偏方，“发病时给病人头上淋狗血，再用凉水冲之。需要请高明的医师指导，病家不要自己做决定，尤其是健忘症者本人切不要乱加干涉。”

邓拓究竟有没有影射之意，几十年来众说纷纭，内敛的邓拓生前没有对人明确解释过。1962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本已略见活跃的社会空气急转直下。两个月后，燕山夜话停笔，邓拓这样对读者解释：“由于近来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我已经不写《燕山夜话》了。”此后邓拓又为三家村写过几篇，但笔锋已柔和得多。

“其他方面的业余活动”指的是古画鉴赏和研究。袁鹰最后一次见邓拓是1965年春节——邓拓离开人民日报社后，每年春节报社同事都会集体去看望他。袁鹰记得，当时邓拓是“赋闲”的状态，看上去心情比较好。他问起《人民日报》开的杂文专栏“长短录”怎么停了。大家说，现在形势紧了，写专栏的人也不愿写了。这个栏目其实是学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开的。邓拓心中明了，不再说什么，转身拿出刚在荣宝斋收的字画来给大家观赏。

### ◇ 祭旗：“文革”自杀第一人

“文革”终于拉开序幕。第一个被开刀的是吴晗。1965年底批《海瑞罢官》，邓拓本来还在写文章替吴晗说话，但矛头很快就指向他。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被指为三家村反革命集团开路先锋，市统战部部长廖沫沙是“执鞭”的“兄弟”，文风最犀利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则是领军的“主将”。斩“将”是为把他身后的“帅”拉下马。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写道：“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171篇杂文只是邓拓蒙冤的导火索。祭旗这个词的确概括了邓拓在这场浩劫中的厄运。

1966年5月16日，致命一击降临。就在这一天，“文革”纲领《五一六通知》通过，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突然被捕。也是在这一天，全国各报同时转载了戚本禹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文中大批邓拓，其中有一句：“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时期又混进党内。”

“邓拓作为老党员，很清楚‘叛徒’和‘反党’之间的本质区别，被定性为叛徒，就永无翻身可能。”袁鹰说。

那天黄昏，丁一岚下班回家，眼神示意邓拓到走廊说话——5月份以来，家中警卫员都已换成“监视员”。邓拓劝她带孩子搬出去避避，跟他隔离开，最好明天一早就走。丁一岚说：“好吧，等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回来。”邓拓说：“你怎么这么傻，还有将来吗？”在阴暗的过道里，夫妻二人抱头痛哭，却不敢哭出声音。

5月17日深夜，邓拓给北京市委写了六千字报告表白自己的忠诚，遗书的结尾这样写道：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对于邓拓临终前的“山呼万岁”，有人认为他当时的认识有局限，至死仍怀崇拜；有人说这是一个老革命者的心声；也有人认为这是为保全家人，不做这种“表态”，家人恐怕也难逃牢狱之灾。邓拓无意间开启了一种“格式”，在他身后，翦伯赞、傅雷等知识分子的遗书，也都做了这样的“表态”。

5月18日凌晨，邓拓服安眠药自杀。他给妻子的遗书写道：

“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创伤。

永别了，亲爱的。”

邓拓去世第二天，他的诗词信件书籍等皆被抄走。丁一岚冒死藏下了两方诗帕，是邓拓亲笔写给她的情诗。下放劳动时，她把诗帕缝在棉袄里，严寒中穿着棉袄干活，汗水把诗帕上的字迹都洇了。这两首诗，一首写于结婚六周年；一首写于1944年整风运动，邓拓因抗战前曾被国民党逮捕，两次遭怀疑和审查，他将忧郁和相思之情写成长诗《战地歌四拍》寄给丁一岚，其中几句似乎暗示了他一生的命运：“古道凄清埋诗冢，高山流水休再听，广陵散绝，无复当年韵。”“想旦夕四野动烽烟，顾不得惊起伯劳飞燕各西东。漫负笈携囊早登程，且休回首，向莽莽平沙去处舞干戈，莫念那恒岳巍巍云里人。”

□ 《文史参考》第2012年05期

~~~~~

【当事者言】

解读山海关机场机组走留现象

• 康庭梓 •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座机256号三叉戟在山海关机场载着林彪等人强行起飞时，机组9人中只有机长潘景寅与3个机械师在飞机上，机组其他5人没有上飞机，他们是：两名副驾驶、领航员、通信员及服务员（女）。40多年过去了，九一三事件给人们留下的种种谜团中，也包括机组人员的走留问题。我作为机组副驾驶之一，亲身经历了9月13日凌晨山海关机场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多年来，人们围绕机组有走有留问题有各种议论。最普遍的说法是机组其他5人没有来得及上飞机。第二种说法是机长想让机组其他5人多休息一会儿，没有同机械师们一起叫他们起床上飞机。第三种说法是还没有确定飞机的起飞时间，不必都上飞机。第四种说法认为机长这样做是有意的，说明机长潘景寅知道叛逃内情。还有人说，机长最应该带的人是副驾驶、领航员和通信员，不应该带3个机械师。

九一三事件之所以让人感到扑朔迷离，其原因之一就是如此重要的专机竟然只有一个飞行员就驾驶升空了，仅此就开创了世界航空史上的先例。大家都知道，除了小型的商务机外，中型以上的运输飞机都是由机长和副驾驶两个人驾驶的，驾驶舱也相应应有左右两个驾驶员的位置。正常情况下正驾驶（机长）在左边，副驾驶坐在右边驾驶。有时候机长也可以坐在右边带飞学员或新飞行员。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允许只有一个飞行员就驾机升空。因此，在世界航空史上，还没有听说过有一个人驾驶的，更不要说一个人驾驶国家的重要专机飞行了。大飞机既然安排两个人驾驶，主要是飞机较大，设备复杂，飞机活动半径大，遇到的机场或天气情况复杂，尤其在特殊情况下，一个人不能胜任，需要分工合作，互相配合才能保证飞行与起飞降落的安全。9月13日，机长为什么敢一人驾驶，这是另一个话题。现在重点谈一下机组的走留问题。

当时的基本情况是：9月12日夜，机组开完会，机长安排好第二天的工作之后，除机长潘景寅外，机组其他8人都在自己的房间，最晚23点已经入睡。机长一直待在调度室主任李海彬的房间，没有睡觉。9月13日0点5分，机长从保密电话旁接到一个电话后，就让李海彬安排给飞机加油。当李海彬通过机场内部电话要油车的时候，机长走出房间将睡在另外同一房间的3个机械师叫起床。我和领航员老李就在机械师的隔壁，只要机长再往前迈两步敲敲门，再继续向前两步敲敲门，我们和睡在我们隔壁的副驾驶和通信员两个老陈也都会一起起床。但是机长没有这样做，我和老李连机械师起床时的一点动静都没有听到，这些李海彬也不知道。机械师到机场停机坪（百十米的距离）后，去掉机身所有的堵塞、堵盖、插销、布套，拿掉所有活动舵面上的夹板及两台发动机上的蒙布。由于飞机大，机身高，有时需要一个人手扶梯子，另一个人爬上去才能将部分夹板取下来（需要10到15分钟）。出差在外时这些工作多数是机组全体人员一起干的，然后给油料留样，给飞机加油。由于压力加油不行（头天晚上就试过），机械师必须爬到机翼上，打开油箱上盖，用重力加油的方法进行加油。

0点22分，一辆红旗牌轿车在飞机的左后方戛然而止。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急忙下车登上飞机。此刻，特设师邵起良才发现机组还有一半没有到机场，于是，就拿起放在停机坪边上的场内电话要到李海彬：“首长都到了，机组怎么还没来！”此时，李海彬才急忙跑出来敲我们的门。当我刚穿好一条裤腿的时候，就听到了飞机发动机启动的声音。等我们两个跑出房间的时候，另外两个老陈已经跑在了前边。等我跑步能看到飞机的时候，发现随着发动机的轰鸣飞机快速滑了出去。飞机最后的起飞时间是1971年9月13日0点32分。这个时间是机组提供的，被载入了史册。

从表面看，机组的4个男人是提着裤子奔向飞机的，还没有赶到停机坪，飞机就急忙滑向跑道，看上去的确是没有来得及上飞机。服务员小魏由于起床动作慢，等她起来的时候飞机已经起飞了。造成这种“来不及”的根本原因是机长潘景寅有意安排的。从各种迹象分析，潘景

寅是按照林立果的授意，积极主动地导演了山海关机场这部历史的活剧。但有一点必须强调，潘景寅这样做并不能说明他是叛逃的知情者，很多细节证明，潘景寅同样是受害者。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潘景寅自己怎么也不可能想到是自己为自己安排了一条通往死亡的路。

0点5分的那个电话（两部保密电话机中的一部），很可能就是林立果从北戴河打来的。因为此前林彪女儿林立衡已经把256号三叉戟飞到山海关的消息通过警卫林彪的负责人报告给了北京的周恩来。周恩来还和叶群通了电话，并责令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调查256号三叉戟的事情。此刻的“林立果们”意识到按原计划飞往广州另立中央已不可能，于是就破釜沉舟改为北逃。对叶群、林立果来说，一旦决定北逃，他们最担心的就是飞机的准备情况及9个人的机组。如果按原计划飞往广州，因为是国内飞行，仍可以用“重要专机”的招牌欺骗下去。因为一个副统帅在自己的国家飞行，想到什么地方落地，只要一句话，从机组到地面保障，都会按照最高级别的标准为专机提供一切需要的资料，保证专机安全飞行。但是，改为北逃后，“林立果们”同样明白，再用“林副统帅”的光环继续蒙骗下去是不可能了。林立果、刘沛丰在空军多年，深知飞行员们在党的教育下应具备的阶级觉悟和严把空中防线的政治敏感性。平时靠近国境线飞行，如果遇到雷雨天气需要绕行时，宁可偏向国内方向50公里，也不能偏离国境线方向1公里。因此，256号三叉戟一旦升空，叛逃的航向就会一下子将他们的阴谋彻底暴露，到那时，面对9个人的机组，在空中他们是没有把握控制局面的。林立果经常坐飞机，曾学习驾驶直升机，也对三叉戟驾驶舱进行过了解，同样熟悉专机组的业务分工及活动规律。所以，当他们下决心叛逃后，就会打电话告诉潘景寅“准备起飞，机组人员越少越好”。

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毛泽东、林彪就是党、国家、军队的领导核心。林彪作为写在党章上的接班人，头上的光环使虔诚的人们对他的信任达到了迷信的程度。林彪不可能直接给机长下达命令，其儿子林立果就代表林彪。潘景寅对此不可能产生任何怀疑，不但坚决执行，而且超水平发挥，“誓死捍卫”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实际行动。潘景寅竟然冒着一人驾机升空的风险，也要“誓死捍卫林副统帅”，这一点已经被历史事实所证明。

给飞机加油、加多少油是机长自然想到的，飞行员的职业习惯，无须别人交代，再说，头天晚上就要加17吨油而没有加成。但是，如何控制飞机机组上的人员最少，对机长来说并不容易。

其一，机长利用主任打电话要油车的机会，把机械师叫起床。巧合的是招待所每间房子里也只有三张床，房间是我分配的，机长职位高，住在单独的高档房间，与机组不在一起。其他人员都是按照在单位的建制分配的，我和领航员是飞行大队的，另外两个是团司令部的。假设机械师与机组其他人混住，大家就会一哄而起。历年来，在外场执行任务都是机组一起到机场准备飞机。这次，半夜到机场加油，更说明时间紧急，机组其他人没有任何理由继续留下。只有机组在外地值班，白天业务学习时，机械师到机场维护飞机，其他人在驻地学习。按照机组业务活动的规律推断，机长叫醒机械师时，会向他们交代：你们先到机场把飞机准备好、加油，我和机组其他人再研究一下航线。这样，机械师们当时就不会叫我们起床，到机场后，没有什么特殊隋况也不会回来。

其二，机械师走后，机长并没有跟随一起到机场，而是继续回到调度室。他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继续通过电话知道来自北戴河及北京的信息；另一方面如果机械师有情况来电话，他可以灵活处理，防止机械师回来发现机组其他人并没有起床。此外，还可以防止李海彬发现机组的反常情况，因为调度室人员同样熟悉机组外场活动的规律。

潘景寅很可能是听到林彪座车的声音后离开调度室的。汽车进入机场到停机坪的路距离招待所很近。也可能林立果在电话中，已经告诉他出发了。北戴河林彪住地联峰山距离机场约4

0 公里，快速行驶需 2 0 分钟。所以，机长到机场的时间基本上也是 0 点 2 0 分。潘景寅离开调度室到停机坪直接登上飞机，没有在飞机旁边做任何停留，也没有给机械师任何询问的机会。到此为止，机组走留的局面已基本形成。如果邵起良上飞机前没有打那个电话，直到飞机起飞，我们 5 人仍然在睡梦中。

从潘景寅当晚活动的时间表可以看出，他接电话叫机械师起床到最后离开调度室到机场，至少有 1 5 分钟的时间，他完全有时间和机会把我们叫起床。也就是几步之遥，举手之劳，敲门就可以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直到登上飞机之前，不叫我们起床的想法都没有动摇过。事后，我曾仔细地问过当时在场的山海关机场地面专机保障人员，机长是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登上飞机的，回答是没注意或者没有印象了，但对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上飞机的印象很深。说明潘景寅从接到电话到登机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内，各项活动的安排十分周密，衔接恰如其分，没有让调度室主任及机械师知道我们 5 个人仍在睡觉。

当了解上述基本情况之后，关于机组走留的有关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既不是让机组其他人多休息一会儿，也不是不知道什么时间起飞，更不属于机组在执行任务时正常外场活动的结果。

关于有人提出“机长带上副驾驶、领航员、通信员也比带上机械师有用”的问题，就更好解释了。因为准备飞机离不开机械师，没有机械师也不能给飞机加油，机械师以飞机为家，连飞机舱门上的钥匙都在机械师手里。一句话，没有机械师，飞机将寸步难行。

机组按业务有飞行驾驶、领航、通信、服务、机械等分工。他们在专机部队也分属不同的业务部门管理。但是，在执行专机任务中就是一个完整的战斗集体，严格分工，密切配合，保证安全、圆满地完成专机飞行，并在共同的任务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允许把机组中的任何人丢下。然而，机长潘景寅设计并导演了 1 9 7 1 年 9 月 1 3 日凌晨山海关机场这一幕历史的活剧，在共和国专机活动的历史上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页。在机组人员有走有留的一场中，他扮演了主要角色。在“林副统帅重要专机任务”光环的笼罩下，潘景寅把自己送上了绝路，成了牺牲品。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认为作者是得便宜卖乖，当初提裤子追飞机，没上去才活到今天，才有了写文章解读的机会。的确。4 0 多年来。我一直庆幸在如此重大的事件中能有这样的结果。这也正是我以回忆录的方式让读者了解历史的初衷。

□ 《党史博览》2 0 1 2 年 0 1 期
~~~~~

【名人往事】

我所见到的叶群

• 程 光 •

—

我知道叶群的样子，是看了一张相片，那是六十年代初林彪在公园休息散步时拍摄的。林彪身着灰色中山装，戴着帽子，有个衣着简朴的妇女在身边。他们和其他的游人一样休闲地走着，看得出来旁边有特殊的警卫。那时中国领袖人物的肖像在公共场合张挂，正中是毛主席像，两边的是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和总书记邓小平的像。他们多数人形象为

人们所熟悉，因为常常可以在报纸画报上看到他们的身影，只是陈云、林彪深居简出，而他们夫人更鲜为人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课闹革命，我所在的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四处奔走，哪里有首长接见讲话就到那里去看去听。因为我父亲邱会作在军队工作，我特别关注全军文革领导小组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只要知道就会赶去。我在人群中远远地看到了叶群，她是全军文革成员。

1967年1月，我的父亲遭受造反派的连续武斗被打成重伤，在他将被造反派置于死地之际，被叶群持林彪的手令接了出去，安排到西山治疗休养，那里是中央军委战时指挥所军事禁地。我们全家从心眼里感谢做出这一决定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也感谢促成这件事的叶剑英和深夜到总后大院接出人来的叶群。

1967年3月底，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在总后礼堂召开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我父亲恢复工作的决定。那年晚春的一天晚上天黑之后，我正在总后大院的家门口，突然有辆小轿车停了下来，有人下车问这里是不是邱部长的家。我说是，但他现在不在家。来人又问，你母亲在吗？我说在。

他回去开了车门，一个中年妇女下了车，我一看是叶群。她问：“你是老几？”她猜出了我是谁。我说：“是老二。”我一边朝屋里喊，“有客人来了！”一边把叶群领进家里。叶群见到迎出来的我母亲说，来看看你和孩子，也来看看你们的家。

叶群在我母亲的引领下看了看，说：“没想到你们的家这么简朴。”她坐下来和我母亲说起了话，谈的都是日常起居和家常之事，没有一点“政治”，她操北京普通话口音，和蔼善谈。

叶群没有彼时“中央领导”的威严，看上去亲切随意，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位来串门的阿姨。叶群坐了大约不到一小时要走，在她即将起身时，我拿出了我的《毛主席语录》，请她题词。我作此举，自己都觉得有点唐突。叶群并不介意，接过了语录本，在扉页上写了“读毛主席的书”，下面签了“叶宜敬”。我很惊讶，她似乎看出来了，说这是她参加革命前的本名。

事后我才知道，叶群1920年生，祖籍福建闽侯，为书香门第望族，童年时被父亲带到北京读小学，成绩一直优异，青少年时接受革命思想，193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读书时投身“一二九”学生运动，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初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转为中共党员，1938年到延安，曾任中国女子大学组教科科长。她的资历比一般人猜想的要早得多，是抗战之前红军时期的“老革命”。

## 二

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我的母亲带我们出门，说是到毛家湾，那里是林彪的住处。我很早就知道那里，因为我就读的北京四中和那相距很近，我放学回家，总要路过那里。我们高考之前的体检在平安里医院，它是与毛家湾林彪住处只隔着一道墙的小医院。体检时同学们议论说，隔壁住的是中国最年轻最能打仗的元帅林彪。

此时我再到毛家湾，平安里医院已迁走，改成了中央警卫团的驻地。我们进了门，叶群迎上来，领着我们到了一处简朴的客厅。叶群对我母亲说，她和邱部长经常见面，和家里人见的少，接你们来坐一坐玩一玩。后来我才知道，中央为了加强军队的领导，成立了军委“四人小组”（军委办事组的前身），其成员有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和叶群，父亲和她成了同事。

那天在场的还有林立衡，又叫林豆豆。我曾在报纸上看过她回忆原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散文，文革初期又读过她写的《爸爸教我写文章》，知道她在空军报社工作。我们刚到时，林立果朝我母亲问了个好，不久就离开了。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也曾就读北京四中，高我一级。我原来就认识他，只是没有当面说过话。这次他问了一句，“你在清华呀？我们在四中时见过。”林立果穿着空军衣服。之前我在北京大学看大字报时，听那里的同学说，他已离开学校到空军参军了。

叶群和母亲聊天时，让我九岁的妹妹坐在身边，问她在家里作些什么？大学中学小学都已停课，妹妹没法上课了，有时和小朋友们在一起唱歌跳舞，当宣传歌颂毛泽东思想的“红小兵”。叶群听到这儿，对一边的林豆豆说，找一些书给小妹妹看，要找一些好书，人要从小好好读书学习才行，别荒废了时光。

叶群说的“好书”是什么？我很想知道，那时盛行赠送各种印刷精美的毛泽东选集或“歌颂红太阳”的书，它们既是一种“忠字品”，也是生活工作必用之物。人们每天早上起来的“早请示”要挥动《毛主席语录》本，而“天天读”则必须读上几段毛主席著作，有时还要背颂。

过了些天果然送来了几本书，它们已经有点陈旧，是文革以前出版的适合儿童的读物。我记得有《西流水村的孩子们》、《白洋淀》，还有不能凑成整套书的几本《十万个为什么》。我随手拿起来看了看，书脊上贴着公共藏书的专用编号标签，有的封面上有“空政图书馆”或“空军报”的印记。

我还记得《西流水村的孩子们》的内容。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它是学校要求的暑假课外读物，内容是描写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北方农村里一群少年的生活。书中有一个情节让我印象很深：孩子们脱下自己的布鞋，一只连一只地把通过村子附近铁路的转弯处内侧铁轨垫高，使急速行驶而过的日本鬼子军用列车颠覆了。他们成了“抗日小英雄”。

以后，叶群又送来了一些学习写毛笔字的字帖，还有她亲笔写的一些条幅，其中有几个是写给我妹妹的，具体的字我记不准确了，都是一些要奋发学习的座右铭或古训。叶群的字工整漂亮有力，看似柳体，字距行间整齐、排布有序，初看上去有如书法精品，但我贴近了端详，发现上面事先用铅笔轻轻划上格子，写好毛笔字后再擦去，一些地方留有线格的痕迹。虽说书法佳品要有功力，并非一天两天就可以成就，但叶群如此专心用功，还是令我惊讶。这么久了我还记得这件事，因为当时无论墙上挂的还是书上印的，凡是鼓励人们学习的警句，都是马列和毛泽东的语录，突然看到叶群书写的那些当时被斥为“四旧”和“封资修”的内容，令我感到很新奇。从那以后，我有意找了很多中外历史和哲学理论书籍阅读，使我在那个年代里没有浪费更多的光阴。

### 三

那个时期，每隔三四个月，叶群就会请我们到她家中去，主要是看电影，多是一些国产片，还有香港片。在少有文化生活的文革当中，这是我非常向往的。休息中叶群和我母亲说一说话，大多是生活和健康，我母亲是经验丰富的医生，她们谈得投机。

我见到的叶群只穿军装，有一次我母亲说她的衬衣颜色不错，叶群解开军衣上面的扣子让她看，是一件没有衣袖的“假领子”。叶群笑着说，这样节省也好洗，但穿上了要小心，不能露馅。

1968年春节，母亲带着我们去给叶群拜年。我们在客厅里坐了一会，一个工作人员进

来对叶群耳语了几句。叶群对我说，“首长叫你去一下，问问学校的情况。”

我进了一个长形的约有三十平方米大小的会客厅，里面显得空荡，只有面对面地摆着两套陈旧沙发，没有任何其他摆设。林彪坐在那儿，我感到非常拘束。他示意我坐在他旁边，用祥和的眼看着我，让我放松了紧张的心情。林彪问我清华大学里的情况，学生们都在作什么。我大概介绍了一下，提到了校内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的情况。我在说，林只是听，当我说到造反派批斗老师，打击不同派别的同学，还派出了人到全国各地参加对当地的党政机关夺权、参加打砸抢时，林彪说了一句“那样不好。”脸上流出了一丝不满的表情。

我们说了大约二十分钟，内勤进来了，说叫我出去吃饭。他托着一个大盘子，上面有一个普通保温杯和擦手的毛巾、餐具。当他把保温杯放在茶几上把盖子打开时，里面用白开水泡了一个白面馒头。

我被领着到了餐厅，叶群已经陪着我母亲和弟妹在那儿了。饭桌上摆了四盘菜，一个青椒炒肉丝、一个西红柿炒鸡蛋、一个炒白菜，一个红烧对虾。叶群说：“自己人，就简单点。”豆豆说：“平时没有这么好，今天特别加了菜。”她用手指着那盘红烧对虾。

晚上看了电影，我们临走时，叶群送客到门口，说了句，“老二很懂事，聪明机灵”。我想她是指刚才林彪找我问话的事吧。

#### 四

1968年4月6日凌晨4点多，我从睡梦中被父亲叫起来，他问我在学校里散布过中央文革什么坏话没有。我说，春节去林彪家时我说过造反派的情况，我最近因为肝脏检验指标高，一直在家里休息，没有去过学校。父亲训了我一句“你别给我惹麻烦，给我走远一点！”早上7点钟，我被匆忙送到西郊机场，搭乘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返回长沙的飞机离开了北京，然后到了驻广东的解放军四十二军，用“程光”的谐音以名代姓当兵锻炼。

我由此开始了军旅生涯，这个改变我生活轨迹的事中有叶群。这是我后来我才知道的。

那是在1968年4月5日晚上的中央碰头会上，江青突然拿出一叠材料说：“邱会作的儿子是清华大学反中央文革的头目，应当逮捕归案。”之前，江青用这种方法整了“联动”红卫兵组织，抓了董必武等许多高级干部的子女关进监狱进行残害。

面对江青的追查，叶群急中生智说：“老邱的那个儿子早当兵去了，不在北京。”江青哑口无言。事后我还听说，叶群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温玉成打了个招呼，要他对清华大学管事的人说说，别揪住老邱的儿子不放。但我仍然小心谨慎，在部队里，除了师团主要领导知道我是谁，其他人不知道我一个大学生为什么突然到连队来当兵。这样不但让我很安全，也没有什么特殊照顾，使我得到了锻炼，虽然部队生活非常艰苦，但比那些被江青点名抓起来关进监狱的干部子弟处境好多了。

1969年以后，在校大学生开始了分配。因为有人关照，我的档案和分到广州军区的大学生档案一起从学校送到了部队干部部门。江青揪人的风波终于躲过去了。

#### 五

当兵锻炼半年后我被调到团政治处当见习的宣传干事，从此我有了休假，每年回到北京的



假期里，总会遇到一两次到毛家湾那儿的机会，是叶群叫我母亲带着子女去，常常是玩一玩和看电影。叶群对其他一些高级干部也这样，包括一些外地来京的军队领导和他们的家属。每次我见了叶群，她都和我讲几句话，问问我当兵和部队里的情况。

1970年7月下旬我休假并为部队办点事，回到北京之后，见我母亲向北戴河打电话，知道叶群他们在那。我母亲在电话上和叶群说到我哥哥的婚事。

我未来的嫂子叫张克非，是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的女儿。张部长于1967年“一月风暴”中被矿业学院的造反派活活打死，遗体脖子上有勒痕，脑后有一个血洞，前额被打破塌陷，全身到处是伤，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伤口三十多处，特别是他背上的伤是用刀一刀一刀割的，这叫“千刀万剐”……中共中央下达文件，说张霖之是“刘少奇在煤炭战线的代理人”。造反派说他是“自杀”，自绝于人民。

这位文革殉难者惨烈牺牲后，我听到了另外的声音。我的朋友、王秉璋的儿子说，林彪有次对王秉璋说：“你不要怕造反派！张霖之不怕造反派，才被打死的。”解放战争时王任二野11纵队司令员，张霖之为政委。张从来没有当过林彪的部下，林彪能这么说，可见他对受造反派迫害者的同情。

尽管如此，在那种情况下我哥哥的婚事看来是不可能了，因为涉嫌为一个被毛泽东“点过名”的部长喊冤。但是到了1970年夏天，事情有了转机。我父亲在为此而努力，叶群也在帮忙，他们找到了周恩来，建议用一个“内部结论”把事情办了。

1970年7月29日晚上12点多，通常要在次日凌晨才回家的父亲提前回来了。他对我说，早上天亮了到你克非家去一下，说“她们家的事，总理批了。”周恩来的批示意思父亲对我说了，核心的话现在可以在《周恩来文选》中查到：“张霖之在武斗和逼供的混乱中死去……张霖之同志的死亡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张霖之同志的家属和他的子女不受任何牵连，应按照革命干部家属看待……”

我早上六点多钟就赶到了在西单附近的小酱房胡同29号院子张宅。清晨胡同里还没有什么人，我敲院子的大门很久没有人开，就翻墙跳进去。小保姆惊慌地给我开了房门，已躲藏起来的张部长夫人李蕴华出来说，以为是造反派来找她麻烦。我把周恩来的批示大意说了，李姨非常激动，等她略为平静一点后突然问，为什么不明确说是“平反”，不说“张霖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我按着父亲交代的说，这等于是平反了，现在只能办到这样。

我回去以后，把李姨说的“不过硬”对父亲讲了。

第三天正好是“八一”建军节前一天，军委办事组在首都体育馆请周恩来看表演让他休息，周一见到我父母亲就问：“路光和克非的婚事办了没有？”刚从北戴河赶回来参加八一庆祝活动的叶群说：“孩子们还在外地呢，老邱担心总理这种批法不过硬。”我父亲说：“还请总理写个批示吧。”周恩来说“不能耽误了孩子们”。说罢写了一张便函。

家里决定立即举行婚礼，但哥哥嫂嫂正从外地的部队向回赶，母亲叫我和一个秘书先到管民政的地方去办登记结婚手续。管事的人指着我问，“新郎是他，女的呢？”秘书答：“男女明天才能赶回来。”“人没来登什么记？不行！”那人有点生气。秘书展示了周恩来的便函，“同意邱路光和张克非结婚。愿你们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周恩来 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那个管事的人不敢相信是真的，看了秘书的工作证后说，“可以，可以，总理批的还能不办！”

九月里，我休假后为部队办事结束了，要回去了。一天下午，母亲对我说，毛家湾那叫我们去。因为哥哥已休完婚假回部队了，只有我和新嫂子随着母亲一起去那儿致谢。我们见到了叶群，她说：“刚从北戴河回来下飞机，耳朵里还嗡嗡叫呢。首长累了就不打扰他，我就代表了。”一会儿，内勤出来说：“首长听说了，立刻就要见。”我们进入客厅，林彪已站在中间等候。他很长的白胡子没有刮，身穿灰色中山装，布鞋。叶群立即上去，拿起放在茶几上的帽子向林彪的头上一扣，然后介绍了克非。林彪说：“张霖之是好同志，死得很可惜，现在好了。”克非说了感激林彪的话，叶群说：“别谢他，要谢伟大领袖毛主席！”

叶群送给我哥哥嫂嫂一首她填的新词，是叫他们要一生紧跟毛泽东干革命的，内容我记不住了，记得最后一句是“终生学先导”。

为了表示感谢，我母亲请人给林彪打了件毛衣。之前，叶群和我母亲聊家常时说，“他（林彪）在穿上从不讲究，有什么穿什么，除了军装以外，没有多少衣服。”母亲得知林彪一件毛衣穿了多年已陈旧，就托人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买来些他们生产的好毛线打成毛衣送了过去。因为不想让林彪事先晓得，又不知道他喜欢什么颜色，就打了黑色和米色的两件可以挑选。那次，叶群对我母亲表示谢意，还说，“他喜欢米色的，说穿上黑色的毛衣就成了一个‘黑狗熊’了。”听到这儿我乐了，都以为林彪总是不苟言笑非常严肃，没想到他也有诙谐幽默的时候。

## 六

1971年7月底，我又回了家。我们团里要提一个干部，东北辽宁人，有些家庭问题需要外调核实，一般是有人出差或探亲时顺便去，部队挑选了我。这样，我在办完事后休假，来回路过北京多了几天在家。我见母亲常和北戴河的叶群常打电话，谈的多是林豆豆婚事。8月4日，母亲突然说，叶群从北戴河回来看病，她和父亲要看她，叫我也随同一起去。在汽车上，父亲和母亲约定，说他有事忙，要先走，叫我母亲多坐一会儿，免得失礼。果然，父亲到了那儿和叶群说了几句寒暄话就告辞了。

叶群对母亲说，豆豆有男朋友了，是广州军区四十二军一个医生，叫母亲看看，再问一问他的业务水平。我说我就是四十二军的，叶群说，是吗？说不定你们还认识。

林豆豆和一个男青年来了，叶群作了介绍，说这是小张医生。母亲一问，我发现这么巧，他居然是我所在的一二四师师医院医务所长。我在下面的团里，但毕竟在同一个师。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敦厚。

大家说了一会儿话，叶群使了个眼色，我母亲开始和小张聊起了医学上的事，他从容不迫地回答着。我母亲非常重视临床经验，问他，你有没有遇到过少见的疑难杂症并及时处置的？小张说，在为地方群众巡回医疗时，曾遇到抬来的一个肚子极度鼓胀处于生命危险的老年妇女，化验检查指标都正常，问诊时病人表情忿恨不肯说话，家属只是哭。细问之后知道，是几天前病人和儿子媳妇吵嘴后才发的病，曾几处求医都说不出什么，吃药也不见好。小张医生决定针灸，几针扎下去，再请儿子媳妇好言劝慰，婆婆腹内一阵鸣响，出了虚恭……听到了这，叶群问，“虚恭？”小张欲说但没开口，我母亲说，“就是放屁，出恭就是拉屎，虚恭是中医说放屁的文雅词。”小张红了脸，说病人肚子瘪了下去，自己走回了家。母亲点评说，老太太和儿子媳妇吵架精神受刺激，抑制肠子正常蠕动，消化道内滞气鼓胀，服药一时难奏效，此时攻心是主，针灸为辅，患者肚子里的气放光了，病自然就好了。母亲夸奖小张，看病在于找准病因，对症治疗，你处理得好。

母亲对叶群说：“小张西医有基础，中医也懂，更主要是有悟性，成一个好医生，这是最重要的。”叶群听罢一脸笑容。

## 七

1971年9月，突发的“九一三事件”改变了我一生命运。我从部队被押送到广州“办学习班”，其实就是审问，同去的还有我们团里一个二十多岁姓孙的三营炮连副连长。我知道他，1968年入伍的战士、班长。一次上级检查实弹射击，他用82无后坐力炮打出优秀成绩后，一位首长指着三四百米远的一棵独立树说，打掉敌人的“火力点”。他一炮射出，随着爆炸火光，树干拦腰断掉。他即被提升为排长、副连长。我实在想不出他会和“九一三”有什么牵连。我们在受批斗时，在一片“划清界限，彻底交待”的吼声中，他只能苦笑。“学习班”办了十几天后，因为陪外宾到广州的周恩来总理对军区首长说了，“不许动他们，对孩子要一视同仁”，我们才回到部队，恢复了原来的工作。

从那以后，我和那个副连长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我问他为何受此“待遇”，他说他和叶群沾亲。

“九一三”后林彪、叶群的亲属几乎都被审查，这种按血统进行的搜捕非常细致。他到“学习班”才得知了自己涉嫌的“罪状”在于身世。叶群的弟弟1936年参加革命，1949年担任解放军师级指挥员，在战斗中牺牲了。其妻已经怀有身孕，遗腹子出生后，随母亲改嫁给一个姓孙的干部。母亲从来没对孩子提起过这事，外面也没有什么人知这个“隐秘”，孩子一直认为继父就是自己的生父。“九一三”后中央专案组迅速查出了鲜为人知的叶家这支血脉，将他归案。

我问他是何时见到叶群？他说1966冬天他上中学时串连到了北京，因为人生地不熟，没有饭吃，将要流落在街头，就在一个收容的地方给家里母亲打了个电话，等着被遣返。第二天，有个军人找到他，带他到一个军队招待所住下，安排他吃饭洗漱，几天后送他回去之前，那人一处大厅里不厌其烦地问他一些问题。他发现一个妇女路过，在一边看他良久。他的眼光转过去，她就走了。不久她又路过这儿看着他，神情有点留恋。因为是一晃而过，以前他也说不准是谁，这次被告知那次是“和叶群秘密会面”。

我听到这感触很深，叶群在没有得到他养父同意的情况下，想认未曾谋面的亲骨肉却忍了下来，不愿意让他母亲和养父一家人平静安详的生活被打破。办案人员明知早年的遗腹子不可能与二十多年后发生的“九一三”案有关，却硬把他挖出来向上邀功，以示清查工作的彻底。叶群比那些随意抓破别人已经愈合的不幸伤疤的人好多了，至少是尊重他人的意愿又通情达理。

因为找不到那个副连长什么把柄，他被扣上“政治历史”问题被处理复员，在离开部队之前和我偷偷聚了一下。他说现在很苦闷尴尬，养父是个军级干部，却帮不上儿子什么忙，想找个好点的单位，别人都婉拒，最后托老战友帮助安排他到西北地区一个城市当了名工人。我说他已是万幸了，至少比我强，还有个家，还有爱他的父亲母亲，而我，父母生死都不知道。

## 八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我在分别十年后看到了自己的父母和一些劫后余生的人，林豆豆也在其中。1988年父亲从“保外就医”的西安到北京省亲时，林豆豆来看父亲。他们说起话来都提到了叶群。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批判中，人们都把叶群当成了最坏的女人，是敌人派进来的潜伏特务、早就知其恶迹。可林豆豆讲，叶群是毛泽东、朱德一手为林彪撮合的，叶群

并不愿意，是毛泽东等做了工作。我知道，彼时的所谓做工作，就是“组织分配”和“强迫”的代名词。

豆豆和父亲聊天中说出了一个意思，叶群不好，连累了她爸爸。

父亲避开这个话题，说别的了。林豆豆临走前，看样子父亲想和她单独说什么，我走开了一会儿。待豆豆告别之后，我问父亲有什么事要说。父亲说，有些话单独说对豆豆方便，他不同意豆豆说，是她母亲不好，害了她爸爸。

我问父亲怎么说的，他说他讲了三条：其一，叶群有缺点，但同样是冤案中人，到现在对“九一三”没说清楚，都是些没有根据的扣帽子，怎么好全怪到叶群头上？其二，对豆豆抱怨叶群有时和江青交往多了，父亲作了解释，说很多是周恩来叫她去的，打听江青那的底细，以便应对。叶群在这上帮周恩来办了不少事。

我说，叶群有时和江青一起乱说，引起了麻烦。

父亲说，叶群和江青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心里放不下事。她们如果有事就一定会向外说，但也有不同：江青是不分时间场合、无所顾忌地胡说八道，只要高兴就瞎吹乱讲。叶群理智多了，她只对自己相信的人说，而且说得也有分寸。

父亲又说，叶群为人热情，很聪明，记忆力特别好，人缘不错，做事比较得体，绝不是江青那样耍泼欺人的恶妇。叶群的问题是没有多年的党内斗争经验，更没有在长期艰苦的领导岗位中磨练出来的品性，总是唠唠叨叨……父亲的话是那么平淡，好像是在说可能还会遇到的一个熟人。

我说，现在有个流行之说是叶群导演了“九一三”。父亲一口否定，说叶群最多只能说是对身体不好的林彪有某种干扰，要害是堵塞了一些言路，造成他脱离实际。叶群遇事不能浑厚深远，影响了林彪，也影响了他们，但这种影响不是导演了“九一三”。

听到这儿，我问父亲，那你对豆豆说的第三条是什么？

他说他向豆豆提了一下，“叶群是你生母，不要过于怨恨她。”

父亲这句普通家常话令我非常感慨。“九一三”是个历史之谜，为了要解开它，了解彼时的当事人有重要意义。那些人也是有七情六欲的平常人，不能一味只当成“政治小丑”去任意胡说。好在那一段是现代史，离开当前不算久远，还有人认识见过那些当事人。研究历史，对他们不能脸谱式人为丑化，包括叶群，按照本来的面目了解真实的他们，会更好。

——作于2002年

□ 原载《往事回眸》，程光著 香港北星出版社 2012年版

~~~~~

【痛定思痛】

践踏人格的转基因文革

• 萧 瀚 •

去年回老家时，在父亲的书柜里又见到严家其先生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它已经开始发黄，就回想起19岁那年高考结束后初读此书时的惊骇与颤栗。将近25年过去了，这本书的命运就像它的作者，对许多人来讲仿佛并没有在这世界存在过。对一群没有阅读习惯的国民，信息封锁总是有效的，即使像刘宾雁先生那样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说消失也就消失了，遑论仅仅活跃于学术思想界的严先生呢？

被这样悄无声息地精神活埋或许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包括“文革”在内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侮辱被肉体精神折磨被虐杀的千千万万人。他们不是被精神活埋，而是精神与人格被公然践踏，直至肉体的折磨与消灭。

其实，对于许多视人格为生命本身的人来说，人格羞辱这一关就已难渡过，“文革”文字狱的第一个祭品邓拓（马南村）并没有遭到严重的肉体折磨，但因无法承受铺天盖地的大批判而自杀身亡，在王友琴女士的《文革受难者》中说“在1966年5月邓拓死亡的时候，对他的‘批判’到了什么程度呢？他显然没有像后来的人那样遭到肉刑和监狱禁闭，但是，在北京连幼儿园的孩子们都被教了新‘儿歌’：吴晗邓拓廖沫沙，一根藤上仨烂瓜。吴晗和廖沫沙是《三家村札记》的另外两个作者。”而著名的诗人、文字考古学家陈梦家先生第一次服用安眠药自杀前留给世界的遗言则是：“我再也不能被他们当猴耍了。”（1966年9月3日，陈先生再次自杀，自缢身亡，同一天，远在上海的傅雷朱梅馥夫妇也自缢身亡。）而这样死去的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知凡几，这不算最惨的，最惨的是那些被杀人犯们得意洋洋到处宣传的被彻底屠灭者，《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里写到1966年的红八月里，光是北京一地，被红卫兵毒打折磨致死的就有一千多人。

由于缺乏对包括文革在内历次政治运动中侵犯和剥夺人权的恶劣过往的深刻检讨，这国的文革“资源”可谓俯拾皆是。

对于潜藏着暴民之戾的众多奴才自甘奴而言，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威发动与掌控，他们的胆子可能还不足以去直接侵害他人人身，但他们心中的怨毒与嫉恨却会通过语言去损害他人的人格，有人甚至认为言论自由就是可以对人肆意谩骂与言辞羞辱（这种无知与恶意正好应了朋霍费尔的一句名言“愚蠢不是一种智力缺陷，而是一种道德缺陷”）。只有极端蔑视人格、极端蔑视人的精神利益者才会认为谩骂与言辞羞辱是言论自由，这在互联网时代可谓一目了然。网络上无处不在的弥漫着对他人人格的肆意侮辱，仅仅从互联网上就可以得知，中国就是个极度野蛮的国度。而这也正是奴才自甘奴的特征，自由的状态是既没有奴役，也没有被奴役，既不侵犯别人，也不被别人侵犯。可以很确定甚至斩钉截铁地说，任何肆意的无端侵犯性言行都离自由很远，那些认为自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者离自由最远。

只有将人仅仅视为没有灵魂，没有精神、情感需求的尸体，才能认为不需要尊重他人人格。得有多低级的思维能力，得有多劣等的品质，得有多荒谬的逻辑，才能认为人和人可以甚至应该互相羞辱谩骂？（美国诽谤法上因保护言论自由而容忍针对公权力者的尖锐的嘲讽，并不意味着倡导肆无忌惮的人格羞辱）人得多自我作践，才会认为可以肆意羞辱他人——如果你认为可以肆意羞辱别人，也就意味别人可以肆意羞辱你！问题是，即使你愿意被别人肆意羞辱，也不意味着你就可以肆意羞辱别人！历次政治运动中，多少以折磨、作践他人为乐者最终以自贱自奸告终？

那种认为言辞侮辱不算羞辱的人，是把活人当死人看待，是对历次政治运动中因言辞侵权而自杀者的漠视。

对于这种现象的成因，包括我自己在内已有无数人分析过，在一个高度世俗化传统绵长的国度，缺乏精神追求，缺乏圣洁生活渴望的人们，对人格、灵魂这些无形的存在既缺乏基本的想象力，也缺乏基本的自我认知、自我教育能力——缺乏自我认知与自我教育能力者，就不可能了解和理解人性，也就不可能有对人性的悲悯与尊重。即使在前现代全世界都存在酷刑的前提下，中国历史上无所不用其极的酷刑，无论从种类和残忍的程度上，还是株连的广度上，以及恶的创造力方面，都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不能不说，这都是极度蔑视人格尊严的文化与制度产物。

正是在如此的人道荒漠里，我们才看到一场场一次次一幕幕以羞辱和践踏他人人格为结果的网络舆论暴力，不仅仅是个体之间相互的肆意羞辱，还有大量网络暴民的乌合之众集中针对某个人或某些人的人格侮辱。善与善之间相互激发，恶也如此。当一个人被他人辱骂时，有的人出于教养，选择无视，有的人出于厌烦，选择漠视，而有的人出于自卫，选择对骂，但再好的修养，也经不住持久的侵犯，于是前两种人越来越少，以至于实在不堪忍受者只能选择退出或对骂。在我自己经历的那么多场网络论战中，扪心自问，虽然脾气不好，因此对于那些居高临下者有时会有蔑视和更不屑的居高临下，但是对于直接的谩骂几乎从不以谩骂回击，最多会针对不特定对象的现象性严厉批判——我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批判中也含着不少戾气。虽然这些戾气都是回应性的，但以较弱的戾气回应较强的戾气，也依然偏离了理性与人道的大道。

与善相比，恶具有更强烈的放大与示范效应，就如痛苦总是比快乐来得更深刻，让人更容易记住。以被人记取的可能性论，恶行远大于善行。人作为一种忘恩负义的动物，记取他人的善行常常需要同等的善和感恩的心态，同理，忘记他人对自己的恶行也需要人格的修炼——只有以善待他人为基本思维习惯的人才更有可能，记住恶行与忘却善行比忘却恶行记取善行更符合人的天性。因此，程度上基本同等的善恶之间，常常总是恶战胜善，而不是善消融恶。恶与恶之间的激荡与增量，远比善的互动更为容易。今日互联网上的种种恶意，种种恶意推定，种种肆无忌惮地侵犯他人人格，已经成为公共议论中一大毒瘤与公害，一方面它可能确实有疏泄人们日常怨毒情绪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极大地激发了人们之间的相互恶意。将恶言秽语肆无忌惮地滥施于任何人，正是互联网时代转基因文革暴徒、网络红卫兵们的典型特征。这种转基因文革，在其时机合适时，绝不会仅仅限于键盘，完全可能脱下马甲走上大街，而那时将会是现实而直接的人身与财产侵害，那将是无限的惨剧。

今日中国，以政治变革为目标促成好社会的努力一直是人们所希望的，但在此过程中，以正当的、合乎人道与理性的手段去推动这一进程，远比一个一揽子美好目标更重要。在政治制度未变时，人们若不能有效地自律，相互之间尊重人格以及其他私权，那么正常、良性的政治变革就会遥遥无期，即使有变革，更大的可能性是恶性的变态的逆向变革，没有哪种好制度能够在—群毫无伦理自觉与伦理自律的恶棍手里正常运转。

在这个批评伪公权的言论自由动辄被剥夺、肆意攻击普通人的侵权言论却被放任甚至鼓励的言论环境下，无权无势者唯有尽可能相互尊重人格的和睦与自由联合，并且将精力集中于抗击伪公权的战斗中，才会有既没有奴役者也没有被奴役者的自由未来。

2012年2月9日于追远堂

□ 作者博客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